

插图本大师经典

插图本
中国神话研究初探



茅盾著

上海古籍出版社

插图本大师经典

插图
本

| 中国神话研究初探 |

茅盾 著

上海古籍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中国神话研究初探 / 茅盾著. — 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 2005.7
(插图本大师经典)
ISBN 7-5325-4074-X

I. 中... II. 茅... III. 神话—研究—中国 IV. B932.2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05)第038683号

插图本大师经典

中国神话研究初探 (插图本)

著 者: 茅 盾

丛书策划: 田松青

责任编辑: 田松青

版式设计: 田松青

装帧设计: 严克勤

技术编辑: 丁剑莹

出版发行: 世纪出版集团

上海古籍出版社 (上海瑞金二路272号 邮编200020)

网 址: www.guji.com.cn E-mail: guji@guji.com.cn

易文网址: www.ewen.cc

经 销: 新华书店上海发行所

印 刷: 上海市印刷四厂

版 次: 2005年7月第1版

2005年7月第1次印刷

开 本: 889 × 1194 1/24

印 张: 8 插页: 2

印 数: 1-4,300

书 号: ISBN 7-5325-4074-X/K · 719

定 价: 20.00 元

如有质量问题, 请与承印厂联系。电话: 021-59886522

前 言

—

著名小说家、文艺评论家茅盾，同时又是一位成就卓著的神话学者，是我国近代神话学研究领域里最早的探索者和开拓者之一。

茅盾从事神话研究工作主要是在本世纪二十年代末到三十年代初，正是他的青年时期，作为“五四”新文化运动文艺战线的一名先锋战士和社会活动家、小说家、文艺批评家，他的研究神话完全是业余的，正如他本人所说的：“往往奔波竟日以后，还不觉得疲倦，还想做一点自己兴味所在的事。于是我就研究中国神话。这和我白天之所忙，好像有‘天渊之隔’，可是我觉得这也是调换心力的一法。”^[1]就这样，他甚至不顾朋友们让他专心写小说的规劝，忙里偷闲，陆陆续续地写了不少神话研究文章。

茅盾从事神话研究，大致可以1925年他的第一篇神话论文《中国神话研究》为界，分为前后两个阶段。

第一阶段，即研究神话的准备阶段。

茅盾自幼在父母的熏陶下，爱看《西游》、《三国》等类“闲书”、“禁书”，酷爱文学。1916年到上海商务印书馆编译所工作。该所图书馆的英文藏书十分丰富，这就给青年茅盾打开了一个新的领域。在新思潮的冲击下，茅盾和当时先进的知识分子一样，迫切地感觉到中国封建主义的崩溃是不可逆转的；而继之而起的東西則只能到外國找，必須向西方尋找真理。因此，他如飢似渴地從

欧洲各种书报中吞咽着外国传来的各种新知识、新思想。其中，欧洲的神话及其理论特别引起他的兴趣。这是有原因的：“当时，大家有这样的想法：既要借鉴于西洋，就必须穷本溯源，不能尝一脔而辄止。我从前治中国文学，就曾穷本溯源一番过来，现在既把线装书束之高阁了，转而借鉴于欧洲，自当从希腊、罗马开始，横贯十九世纪，直到‘世纪末’。……因而也给我一个机会对十九世纪以前的欧洲文学作一番系统的研究。这就是我当时从事于希腊神话、北欧神话之研究的原因。”^[2]

为了寻求真理，借鉴欧洲，他阅读了大量希腊、罗马、印度、古埃及、北欧以及十九世纪尚处于半开化状态的民族（诸如北美印第安、非洲、澳洲、新几内亚、南太平洋诸岛等）的神话和传说、外国民族志、风土志、旅行游记等等，广泛涉猎了十九世纪后期欧洲人类学派神话学者的著作，对欧洲的神话理论和神话学史有一定的了解。从1918年开始，他先后编写过十多种童话、寓言故事，编纂了中国寓言，尔后，又对《淮南子》、《庄子》、《楚辞》等进行选注写序工作，对先秦诸子，特别是我国古代多含神话的若干古籍有过相当精湛的研究。上述种种，为茅盾研究神话打下了扎实的基础。

1923年，茅盾在上海大学英国文学系讲授希腊神话。此前，曾在《小说月报》介绍过捷克、波兰、爱尔兰民族的神话。

这期间，茅盾曾经发表过一些关于神话的零星的、片断的意见，表现了他对神话最初的见解。例如1917年他曾参加孙毓修先生主持的《中国寓言初编》的编纂工作。孙曾为此书写了一篇长序，茅盾对序中的某些观点颇不以为然。事后他曾回忆说：“他把我们称之为形象思维的，统统称之为寓言；……至于书中

所收《愚公移山》、《夸父逐日》，则是神话，既非‘寓言’也不是‘喻言’”^[3]，提出神话和寓言应有所区别。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早在1921年，茅盾在《近代文学体系研究》^[4]一文中，对文学的起源，文学与原始宗教的关系，神话是短篇小说的开端等问题提出了自己的见解。这后一观点在同时期我国的文学史、小说史中实属首见^[5]。他对文学(包括神话)起源的解释，过分强调原始人冥想的作用，显然受到英国人类学派神话学家泰勒的某些影响。

第二阶段。

1925年，茅盾的第一篇神话论文《中国神话研究》^[6]在《小说月报》发表，这是他运用欧洲人类学派的神话理论来解决中国神话问题的首次尝试。这一年，他开始介绍北欧和希腊神话，在商务印书馆出版的《儿童世界》上连载。茅盾在回忆录中说：“这是我研究和介绍外国神话的开端。”^[7]同年，他着手对《淮南子》和《楚辞》进行选注工作，并分别写了绪言，对这两本重要典籍作了较为深入的阐释。

1928年大革命失败以后，茅盾到了东京。若干神话论文以及他的主要神话专著《中国神话研究ABC》(编者按：即本书《中国神话研究初探》，详见注文)^[8]就是这一时期的学术成果。

1929年茅盾把几年来发表的四篇神话论文《各民族的开辟神话》、《自然界的神话》、《中国神话研究》、《希腊神话与北欧神话》汇集出版了《神话杂论》。还写了几篇介绍北欧、希腊、罗马、埃及印度神话的文章。年底，完成了专著《北欧神话ABC》上下册，次年由世界书局印行)。

此后，由于政治活动和文学创作的繁忙，他就很少再有闲暇从事神话的研究工作了。三十年代中，除了在他编著的几本西洋文学名著读物中，对荷马史诗、希腊神话作过一些粗略的介绍以外，就目前所见，仅写过一篇评述黄芝岗《中国的水神》一书的文章^[9]。

二

茅盾关于神话的著述不外三个内容：对人类学派神话理论的评述；对希腊、罗马、北欧、印埃各国神话的介绍；对中国神话的探讨。其中，以研究中国神话的著述最为丰富，影响较大，学术价值较高，也最能反映他的神话观点。现就他对中国原始神话几个基本问题的认识，对他的神话观作一些初步的剖析。

一、“搜剔”中国神话的“原形”要从神话的性质和内容入手

茅盾认为“神话是各民族在上古时代(或原始时代)的生活和思想的产物”^[10]。中国神话是“中华民族的原始信仰与生活状况的反映”^[11]。这一论述概括了他关于神话的性质和内容的基本看法。

中国神话历来没有荟萃之作，散见于各种古籍中的神话零散而庞杂，增饰颇多。茅盾对之进行了一番辨伪、钩沉、整理和系统化的工作。他认为研究中国神话的第一步就是“搜剔中国神话的‘原形’”^[12]。所谓“原形”者，据茅盾说，就是那些反映“中国民族原始的宇宙观、宗教思想、伦理观念、民族历史最初期的遗形，对于自然界的认识等等”^[13]的神话作品。其他一切“变质神话”^[14](指宗教迷信所产生的“古来关于灾异的迷信，如谓虹霓乃天地之淫气之类……又后世的变形记，及新生的鬼神”等)、“次神话”^[15](指反映方士思想的仙家传说)

等等都不是中国神话的原形，均在排斥之列。非得把此等后加的、引伸附会的伪说除净，方可窥见原始神话的本来面目。茅盾指出，像《列仙传》、《神仙传》和《海内十洲记》一类，都是汉以后出现的方士之徒为迎合当时求仙的君主的意志而杜撰的神仙说，而不是神话。在茅盾看来，原始神话中掺杂的大量的非神话因素，都是后人增饰的结果。增饰者之中不仅有方士、道家、佛教徒，还有史学家、文学家、诗人、哲学家等等。因此，还必须把原始神话同各种神怪小说、史书、寓言等，从性质和内容上加以严格区别。

二、原始人的宇宙观与神话的关系

茅盾反复论证了原始人的宇宙观与神话的性质，内容和特点有密切的关系。他在《楚辞与中国神话》一文中写道：“原始人民……以自己的生活状况，宇宙观，伦理思想，宗教思想，等等，作为骨架，而以丰富的想象为衣，就创造了他们的神话和传说。”^[16]

茅盾根据英国人类学派神话学家安德留·兰的理论，把原始人对自然，对世界的看法归纳为六点，即：一，相信万物有灵，二，对巫术的迷信，三，相信灵魂不死，四，灵魂可变形，五，人死是受仇人暗算，六，对各种自然现象和生理现象迷惑不解而要求解答。简言之，相信万物有灵、灵魂不死的观念就是原人的宇宙观。他在有关神话的著述中常常提到的“原始信仰”、“原始思想”，指的都是原始人的宇宙观——万物有灵观。

万物有灵观(茅盾著述中译为“泛灵论”、“精灵主义”、“精灵崇拜”)说的是原始人“相信万物皆有生命，思想，情绪，与人类一般”。神话中常见的把自然力、自然物神化、人格化、人兽易形，人兽通婚等不合理因素都是万物有灵观

的反映。茅盾指出，万物有灵观与我国汉以后出现的变形观念有着根本的不同；前者相信万物本来就如人一般有生命，有思想；后者则主要靠修炼之功而变人成仙，属于道家的宗教信仰，不是原人的宇宙观。

原人的宇宙观对神话的影响，主要表现在下列两个方面：

第一，丰富的想象是神话的一个重要特点，而这丰富的想象是由原始人的生活状况和宇宙观所决定的。由于各民族所居的环境，生活经验，生活状况和宇宙观的不同，各民族的神话呈现出迥异的色彩。从这一观点出发，茅盾提出了中国神话由北、中、南三部分组成的新见解。他认为洪水神话、共工头触不周山、女娲补天造人神话、愚公移山和黄帝伐蚩尤的神话属于北部民族神话，这些神话显然带有北方民族宇宙观所特有的严肃的现实气味；而以《楚辞》中的神话和《高唐赋》中的巫山神女神话为代表的楚神话则属中部民族神话，以色彩鲜明见长；盘古开天辟地神话则属南方民族神话，产生于南方的少数民族而后渐渐北行^[17]。

茅盾关于盘古神话的见解在我国的神话研究史中具有重要的意义。其一，五十多年前，国内神话学、民族学的研究尚处于发凡阶段，作者在资料极端欠缺的情况下，较早提出这个见解是弥足珍贵的。经过半个世纪以来我国民族学者、历史学者和神话学者对这个问题的研究和考证^[18]，证明茅盾的见解是有学术价值的。其二，茅盾运用比较神话学来解决中国的盘古神话问题具有方法论的意义。他不仅把中国古代神话与外国神话进行比较，而且特别提出要与国内的，尤其是少数民族的神话进行比较，在比较中探求其起源和传播的踪迹，为研究中国古代神话提供了一种正确的方法。其三，茅盾十分重视民族志资料在原始神

话研究中的作用。早在二十年代茅盾就提出南方少数民族的神话是中华民族神话中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是我国神话宝库中珍贵的宝藏,因而“不应该鄙视小民族、不重视其神话”^[19]。他深信“已经创造了盘古开辟天地之神话的岭南民族一定还有其他许多神话”^[20],并说“至于西南的苗、瑶、壮各族,还有神话活在他们口头的,也在搜采之列。这个工作就更繁重了”^[21]。搜采各少数民族的神话,特别是目前尚在流传的活神话,加以比较研究,这是研究中国神话的一个重要课题,至今仍然是十分重要的。

第二,茅盾认为,原始人宇宙观的变化导致了神话的演变。他引证了中国神话中大量的例子(如西王母神话、月的神话、昆仑的神话、羿的神话等等)来探究神话演变的踪迹。

为什么神话会演变呢?茅盾说:“因为‘文雅’的后代人不能满意于祖先的原始思想而又热爱此等流传于民间的故事,因而依着他们当时的流行信仰(着重点为引者所加),剥落了原始的犷野的面目,给披上了绮丽的衣裳。”^[22]其结果,好奇者使之“合理”化,“守正”者使之归于“正”,从各自的方面消极修改神话,于是,神话就变得面目全非了。

首先,茅盾反复论述了神话的各种异化现象(历史化、文学藻饰化、哲学化、宗教化)导致了神话的演变和消亡。他指出这种种异化现象(尤其是历史化)是中国古代神话支离破碎、仅存片断的重要原因,而过早的历史化的确是中国古代神话的一个显著特征。茅盾的见解无疑是正确的。其次,茅盾特别强调神话之所以演变是后代人“依着他们当时的流行信仰”,换句话说,不是按照原始人的宇宙观,而是根据后代人的宇宙观去修改神话。为什么呢?茅盾进一步加以阐释:

“因为历史总是人群文明渐进后的产物，那时风俗习惯及人类的思想方式已大不同于发生神话的时代，所以历史家虽认神话为最古的史事，但又觉其不合理者太多，便常加以修改。”^[23]茅盾论证了文明渐进以后，人类的思维方式与神话发生时代原始人的思维方式有两点不同：原始人认为合理的一切，后代人认为不合理，因而需要修改神话；也就是说，原始人的宇宙观与后代人格格不入了，因而要求后人具备一种与神话的思维方式不同的思维，这是一。其二，原始人“创造种种荒诞的故事以代合理的解释，同时并深信其真确”^[24]，这就指明了这样一种思想，即神话创作的不自觉性与后代人有意识地去修改神话是完全不同的两码事。承认宇宙观对神话创作的能动作用，承认宇宙观是不断变化的，并且从宇宙观以及人类思维方式的变化去探讨神话演变的原因，这无疑是茅盾大大超越于当时盛行一时的欧洲人类学派神话学的地方。然而，茅盾却没有从根本上摆脱人类学派神话学的羁绊，他的探讨到此止步了：是什么力量促使人类的思维方式、宇宙观发生变化呢？他只能从人类的心理因素（心理因素是重要的，但不是最终的、决定性的因素）去寻找答案；或者把神话演变的原因仅仅归结为神话的各种异化现象（各种异化现象无疑会影响神话的变化，但却只是神话演变的外因），从而忽略了导致神话演变的社会经济原因：随着社会的发展，生产力的提高，人类认识世界的能力有所增加，适合于原始时代的思维方式必然要逐渐被另一种非神话的思维方式所取代，这才是神话演变的根本原因。仅仅把宇宙观看成一种独立的精神实体，似乎它本身的自我运动和发展即决定了神话的性质，内容和特点，导致了神话的演变，归根到底，这种神话观还不是真正历史唯物主义的。

三、如何看待中国古代多含神话的典籍

中国古代神话的一个特点是向从来没有鸿篇巨作，因此研究中国原始神话，主要靠各种古籍中的零星记载。二十年代，有西方学者把我国汉以后的一些神怪小说、道家方士之言，伪当“中国神话”加以张扬，以假乱真，受到茅盾的严肃批评^[25]。茅盾认为正确地评价某些古籍在神话研究中的价值，是研究中国古代神话的一个关键。

首先，必须从神话学的角度去权衡中国古籍里的神话材料。大量记载着反映中华民族原始信仰及生活状况的中国原始神话的古籍，主要是秦汉以前的，如《山海经》、《楚辞》、《淮南子》等是研究中国古代神话的主要资料，其中以《山海经》的神话价值最高^[26]。茅盾认为，“搜罗中国神话不特要以周秦之书为准，并且要排斥后人伪造的周秦或三代的书”^[27]。但是，不能以古籍所记载神话时代的先后来判别神话产生的时代，或者以此辨别神话的真伪。他解释说，这是因为神话原不过是流传于古代人民口头的故事，不同民族，不同地区由于文化发展的不平衡（他仅仅指出文化发展的差异），某些故事尚在民间口头流传，被同时代的文人采录笔之于书，“在年代看，固然是晚出，但其为真正的神话，却是不可诬的”^[28]。因此，重要的标准还是看神话的内容和性质，“其中的故事既合于原始信仰和原始生活，就是神话的价值”^[29]。

同样，茅盾又根据某些古籍所记的神话的内容和性质，来判断这些古籍的成书年代。例如，关于《穆天子传》。他说：“今考其内容，言西王母者不过西方一国君，所谓悬圃，不过飞鸟百兽之所饮食，为大荒之泽圃，无所谓神仙怪异之事，则尚近于原始思想，故可定为战国初年人所作。”^[30]

其次，古籍中道家仙话颇多，也就是上文所指出的“变质神话”和“次神

话”该如何对待，是否就弃之不顾呢？不是的。茅盾在《读〈中国的水神〉》一文中说得很清楚，研究中国古代神话当分作两步走，先是搜剔中国神话的“原形”，继而“从秦汉以后的书籍乃至现在的民间文学中考究中国神话的演变”。上述两步，通过前者可了解中国原始神话的性质、内容及特点；通过后者则可探索其发展、演变及消亡的过程。二者互为补充，都是研究中国古代神话的重要步骤。

《山海经》、《楚辞》等古籍都是我国古代神话宝库中的宝贵遗产。“五四”以前历代学者对这些文献的性质和价值都未能作出科学的评价。“五四”以后，鲁迅首次指出了它们对神话研究的价值，茅盾则从理论上加以进一步阐述，各自做出了贡献。

四、研究中国神话的方法

茅盾在《读〈中国的水神〉》一文中很推崇该书作者黄芝岗研究中国神话的方法：

他并不先把神话学的原则加在面前，然后找几件中国水神的传说作为例证地去说明它，他是先一步一步比较归纳，然后达到那个结论——原则。

从比较和归纳具体材料出发，然后得出结论，而不是先有结论，再找例子去论证它，这就是茅盾所主张的研究中国神话的方法。

茅盾介绍了黄芝岗研究中国水神的方法。先是选择及整理材料。口头的、书面的，本地的、外地的有关资料，前人的笔记，各地的方志；流传的民间传说等等，均在搜采之列，“都要参考，而且要用科学方法去整理它”，“解剖它”。

其次是比较和归纳。黄芝岗先从民间口头流传的话的传说入手。他从家乡（湖南长沙）的口头传说杨四将军的故事，论到四川灌县二郎神的传说，并加以比

较，找出共通的东西，探求其发展演变的蛛丝马迹，最终证明其来源相同。然后从历代书本上搜寻有关李冰、许真君等水神的记载，证明各地的水神传说有一个“集合体”，各地的水神传说有沟通的痕迹。长沙的杨将军的民间传说是从四川的二郎神传说脱胎而来的。

最后，黄芝岗得出三点结论：一，水神传说的纷歧庞杂是因为不同的时代、地点，有它们相同的水灾和治水的人物；二，长江一带的水神传说有相当的沟通痕迹；三，杨将军(或二郎神)的威灵和神话的产生是因为有夔巫峡江的滩险。茅盾认为黄芝岗经过比较归纳而得出的结论比较可靠，而且认为他的结论与英国人类学派神话学家安德留·兰的结论是不谋而合的。

上面我们所介绍的只是茅盾研究中国神话所遵循的一些原则。此外，他对中国古代神话的许多具体形象、情节也提出了自己独到的见解，为我们进一步研究中国神话打开了一条宽阔的通道。

三

茅盾的神话观有以下几个特点：

第一个特点是欧洲人类学派神话学的影响。

茅盾从事神话研究，直接受到欧洲人类学派神话学的启发和影响。他的神话著述主要是运用该学派的理论和方法，来阐释神话现象和问题。用他自己的话说，他是“处处用人类学派的神话解释法以权衡中国古籍里的神话材料”^[31]。由于他的神话著述较多，发表时间又比较集中(都在二十年代末到三十年代初)，因此人类学派的影响就显得比较突出。他有关神话的一些基本观点主要是从欧洲

人类学派神话学，特别是英国神话学家安德留·兰的理论中借鉴而来；他的某些神话论文直接取材于兰氏的著作（如《自然的神话》一文即根据兰氏《神话，习俗与宗教》一书之第五章写成）。而他神话观的局限和不足恰恰也是受人类学派影响所造成。

早在二十年代，茅盾对人类学派神话学就给过相当高的评价，他说：“神话之起源是在原始人的蒙昧思想与野蛮生活之混合的表现。以此说为解释神话的钥匙，几乎无往而不合。这便是人类学派优于其他各派的原因。”^[32]半个世纪以后，他曾经取马克思关于神话产生及消亡的理论，以核查人类学派神话学的观点，认为后者“对神话的发生与消失的解释，尚不算十分背谬”^[33]。因此，研究茅盾的神话观，不能忽视欧洲人类学派对他的影响。

第二个特点是有比较鲜明的个人特色。欧洲人类学派神话学虽然对茅盾产生过相当大的影响，但他并不满足于把这个学派的理论简单介绍过来，或者机械地拾取其个别结论和论点，而是吸取了其中某些有唯物因素和发展因素的合理部分，加上他对中国古典文学特别是古代神话的精湛研究与独到见解，形成了颇具特色的神话观。他善于吸取他人精萃，化为自己血肉，用以疏理和探索中国古神话问题。他对神话的一些基本看法（诸如神话是原始人生活和思想的反映，神话和原始人的信仰和心理状况有密不可分的关系；必须从原始人的宇宙观、从神话的性质和内容，对神话与仙话、传说、寓言等非神话作品加以严格区分；在比较中探求神话演变的踪迹；重视民族志资料，以比较的方法研究各民族神话的起源、发展及异同，等等）虽然对欧洲人类学派神话学有所借鉴，但是许多结论都是经过自己的分析、研究，从中国民族神话的具体情况出发而得出来的。他

重视原始人的生活与世界观对神话的性质和内容、产生与演变所起的制约作用，比起欧洲人类学派神话学家之更多地倾向于原始信仰、仪式和心理因素的作用，可以看出茅盾神话观点的独创之处。与国内同时期出版的几部有影响的神话著作(如黄石的《神话研究》、谢六逸编译的《神话学ABC》、林惠祥的《神话论》等等，主要是介绍欧洲人类学派的神话理论，个人见解不多)相比，茅盾的几部神话专著以观点新颖、材料丰富、与中国实际相结合见长，半个世纪以来始终受到国内外研究者的注意和重视。

第三个特点是洋溢于字里行间的革命的批判精神。茅盾接触神话，是在“五四”前夕，是和他“向西方国家寻找真理”的过程同时开始的，因此，他的兴趣和抉择不能不受到“五四”民主和科学的革命精神的左右，目的性很明确。他主张学习外国，但却反对一味摹拟欧美，主张大胆创造。这种“自行创造之宏愿”^[34]，自始至终贯穿在他的神话研究之中。他借鉴欧洲的神话学，是为了“创造一个中国神话的系统”^[35]，为建立中国的神话学，为把中国神话置于世界神话之林，贡献自己的力量。

茅盾以批判的眼光，对他所接触到的中外古今有关神话的古籍，各种学派、各家见解一一加以检验，提出自己的看法，充分体现了“五四”新文化运动所特有的革命精神。首先，他把西方历史上出现的各种神话派别(主要是十九世纪出现的比较神话学派、历史学派、语言学派等等)和较后期出现的人类学派加以比较，认为后者在理论和方法上都比前者更为科学。

其次，他从神话学的角度对我国历代史家、文学家、哲学家关于神话的许多解释，提出自己的见解。比如，他指出我国历史上也有类似欧洲的历史学派和

语言学派的神话观点。我国古籍中把神话历史化的例子俯拾皆是，不胜枚举；而把神话材料解释为“字讹”的也不乏其人，朱熹对羲和的解释就是一个明显的例子^[36]。

比如，他认为历代学者对《山海经》的评述均未能道出此书是我国古代多含神话的珍贵文献这一实质，认为他们的见解代表了历代学者对旧籍中神话材料的一般看法。

比如，他对历史上不少学者对“十日”神话的解释表示不满。他说“从前有许多人说‘十日’非真日，或竟加以历史的解释，如谓十日乃扶桑君的十子；但都不能令人满意。杨慎《山海经补注》以为‘十日’便是‘自甲至癸’的天干；此说颇为新奇可喜，但是太附会了。杨慎不知道神话是发生在原始时代，那时候无所谓‘天干’。”^[37]他认为应该运用人类学派的理论，到原始人的生活里去寻找答案，指出所谓“十日并出”的神话大概是太古有史以前所经历的大旱，在原始人中的一种形象化了的幻想反映。

比如，茅盾不同意自王逸起的《楚辞》注家“把当时的神话材料全部抛弃不引以为解释”，把《楚辞》看成是屈原的思君之作，他认为“南方民族曾有不少的神话靠《楚辞》而保存至今”^[38]，所以对《楚辞》中的这一部分材料，必须从神话学的角度加以研究。他提出：“我认为《天问》是屈原在闲暇时所写的杂感——对于神话传说中不合理部分之感想，和他的身世穷愁无关。”^[39]他的见解对于今天研究《楚辞》中的神话仍然是有意义的。

还比如，在羿和后羿是一人还是两个人的问题上，史家和神话学者历来众说纷纭，至今仍没有定论。茅盾不同意王逸、郭璞等人努力要把二者分清，明其